

書名：《明末清初杜詩學研究》

作者：劉重喜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日期：2013 年 9 月

頁數：529 頁

杜詩之研治，一千二百年來蔚為大宗，已成專門之學。“杜詩學”之名由元好問首次提出，杜詩學之實則肇始於中晚唐。縱觀杜詩學的發展歷程，其間出現過兩次繁盛的局面，一是在宋代，一是在明末清初。明末清初的杜詩學有此前歷代杜詩學的得失以資借鑒，又逢天移地轉的易代之際，再加上特定的文學和學術背景，因而顯得豐富而有異彩，其成就也後來居上。明末清初杜詩學自身的特質，使得它較易引起學者們的研究興趣，自 20 世紀初至今，相關論著可謂壯觀。考察這一類論著，不難發現，其中絕大部分都將研究重點放在少數較為知名的杜詩學者或者著作上，個案研究一枝獨秀，而整體研究太過薄弱。目前關於明清杜詩學整體研究的專著仍是寥寥無幾。從這個意義上說，劉重喜先生新近出版的《明末清初杜詩學研究》實為難能可貴，該書正是旨在對明末清初杜詩學進行整體研究的一部力作。

“明末清初”是一個模糊的時間概念，學者們對它的界定往往見仁見智。考察已有的幾部涉及明末清初杜詩學研究的著作，可以發現對於這一時間段起迄點的設定很不一致。簡恩定先生《清初杜詩學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6 年）一書所取的時間範圍為清順治、康熙兩朝。孫微先生《清代杜詩學史》（齊魯書社，2004 年）一書中對清初所設定的時間範圍則是順治至雍正年間。張家壯先生的博士學位論文《明末清初杜詩學述

論》(福建師範大學,2009年)則將“明末清初”定為自明崇禎元年至清雍正末年。上述各家對時間設定都或多或少有所說明,然而都沒有給出足夠合理的理由。相比較而言,劉重喜先生《明末清初杜詩學研究》一書中對這一時間範圍的界定顯然格外重視。劉著在導論中將杜詩學史上的“明末清初”界定為明崇禎七年(1634)至清雍正三年(1725),並且說明之所以如此界定是根據杜詩學發展的實際脈絡而定的。作者承認明末清初特定的文學、政治和文化背景會對這一時期杜詩學的發展產生影響,但認為更應該從杜詩學自身發展的角度來設定上下限,如此纔更具備內在學理性。為此,書中用了相當的篇幅勾勒出這一時期杜詩學發展的綫索,展示了各個發展階段內出現了哪些注家、注本以及注杜風氣如何起伏變化,試圖還原這一時期杜詩學發展的實況,以證明這近百年時間是杜詩學史上最為鼎盛的一個階段。必須承認,從杜詩學自身發展脈絡著眼來設定研究的時間範圍,是更為可取的一種做法。明末的杜詩學實際已與此前明代以評點為主流的杜詩學不同,因為錢謙益引領的杜詩箋注風氣已經開始。劉著給出的時間起點為明崇禎七年,正值錢謙益完成《注杜詩略例》以及《讀杜小箋》和《二箋》,發凡起例的意義已然具備。劉著將清初杜詩學斷限在雍正三年,正值浦起龍《讀杜心解》刊刻成書。《讀杜心解》承接此前王嗣爽《杜臆》而來,參考諸本而有所駁正,重闡釋而輕箋注,是一部別具特色的創新之作,其後有清一代的杜詩注本能事已盡,再無大的突破。應該說,劉著對起點和迄點的把握是相當準確的,書中所界定的“明末清初”是杜詩學史意義上的明末清初。對這一概念的釐清,可以見出作者強調杜詩學“內在理路”的思想方法,其得出的結論也因此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從研究對象本身出發,劉著緊扣明末清初杜詩學自身發展的關鍵和獨特之處來謀篇佈局。全書分為上編、中編、下編三大部分。上編為《錢注杜詩》研究。作者以《錢注杜詩》為範本,將

杜集的版本、校勘、繫年(包括杜甫年譜的撰寫)、箋注等方面納入《錢注杜詩》專書研究之中,以此作為明末清初杜詩學的文獻學範式。從文獻研究角度來考察杜詩學,明末清初已處於一個“集大成”的總結階段,這一時期的杜詩學文獻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達到了巔峰。劉著於眾多著述中獨尊《錢注杜詩》,這是以《錢注杜詩》的學術地位和成就作為堅實依據的。《錢注杜詩》大開清代注杜之風,在版本校勘、繫年、箋注等方面均有發軔之功,在明末清初注杜、研杜之作中極具典範意義,其體現出的學術思想和學術方法亦對後世學者影響極大。從這一角度來看,劉著以《錢注杜詩》研究為題,統攝文獻學研究的各個方面,不失為一個合理的安排。中編為杜詩章法論。詩法研究是詩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明末清初杜詩學者論杜詩技法以“章法”為中心,這與宋人重視字法與句法、明人相對較少提及杜詩詩法都大不相同,並且這一時期學者論杜詩章法出現了一個顯著的現象,即以八股文法講說杜詩。作者將“章法論”作為論題之一,正是著眼於其重要性和特殊性。下編為杜詩詮釋論。明末清初的杜詩學者在杜詩詮釋方面有其獨特的發揮,在杜詩解意的過程中總結出的“意法”理論是對“以意逆志”之法的新運用。張伯偉先生在劉著序文中談及作者拈此論題,即由衷贊歎作者目機銖兩的敏銳目光。考查劉著附錄三中所列參考文獻,與杜詩解意研究相關之論著屈指可數,可見杜詩詮釋方面的研究仍很貧乏。就此而言,作者以此為論題,可見其獨到的學術眼光。上述三個論題涵蓋了杜詩學研究的主要內容,作者從這三個方面入手研究明末清初杜詩學,是基於整體研究設想和從研究對象本身出發的學術視角而作出的獨特選擇。

劉著以其對學術脈絡的清晰梳理見長。通觀全書,作者對“推源溯流”法的運用表現出相當的自覺性,可謂深得章學誠“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旨。譬如,《錢注杜詩》研究部分,作者在論述杜集校勘問題時,對北宋至明末清初的杜集校勘歷程有

一個大致的回顧；論及錢謙益箋注杜詩，則先將此前的杜詩偽注（尤其是偽蘇注）的產生、流衍作出了細緻的交代。又如，杜詩章法論部分，作者在探討明末清初學者諸論之前，先對宋代以降各個時期杜詩詩法論的側重情況一一加以說明；討論杜詩制題，則詳細羅列了文學批評史上自沈約至明末清初杜詩學者們各自的意見。再如，杜詩詮釋論部分，爲了更深入地理解明末清初杜詩學中“詩以性情爲主”的命題，作者從“詩言志”這一詩學開山綱領說起，圍繞著自先秦至明末清初詩學中“詩”與“性情”之關係，對其發展演變進行了一番追溯。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其中又以對杜集校勘問題的梳理和闡述最爲典型，我們不妨以此爲例，將書中考察杜集校勘的情況用表格形式呈現出來：

時期	代表人物及著作	校勘態度	校勘方法		淵源所自	校勘成就及影響
			版本依據	校勘思路		
兩宋	王洙、王琪：“二王本” 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	重視且審慎	彙集衆本進行校勘	如辭有兩出，則多標明異文	西漢劉向、劉歆父子校書之法	宋人杜詩校勘取得非凡業績；“二王本”成爲後世所有杜集之祖本
明	單復：《讀杜詩愚得》 張綏：《杜工部詩通》	普遍不重視	大多未注明文本依據	大多未注明校勘體例；好以己意改竄古書	明代空疏的學術風氣	明人校勘古籍爲後代學者指責最多；杜詩異文校勘問題在明代更爲混亂
明末清初	錢謙益：《錢注杜詩》	重視且審慎	以宋版“吳若本”爲底本	以一種最近古的本子作底本，以其他舊本作校本，並且參考唐、宋、元人著述的各類文獻	一定程度上繼承了漢、宋兩代學者的校勘思想，又表現出與前人不同的思路	《錢注杜詩》在版本校勘上爲杜集大開生面，錢謙益可算是清代考訂家和校讎家的先驅，實開清學之風氣

宋代杜集校勘的方法源自漢代劉向、劉歆父子。而這一校勘傳統在明代沒有得到較好的繼承，明人無視版本、徑以己意改竄古書的弊病給後世杜集校勘工作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明末清初之際，漢、宋兩代的校勘傳統到錢謙益又得到了接續。錢謙益對漢代、宋代學者的校勘理念有所繼承，但校勘思路與前人已大不相同，他在異文辨正方面的獨特思考已然具備了現代學術的一些質素。本書作者對學術脈絡的密切關注於此可見一斑，其理清學術脈絡的真正用意當是見出學術思想之變遷。從這一意義上說，書中多處“推流溯源”的工作都是富有價值的，限於篇幅，類似例證這裏不再具列。

劉著所涉及的若干論題，無一不是明末清初杜詩學之肯綮，可以說，這是一部以問題為中心的論著，有著強烈的問題意識。舉其要而言之，上編部分以《洗兵馬》一詩為切入點，對錢謙益和朱鶴齡注杜之爭這一學術公案進行討論；中編部分對仇兆鰲《杜詩詳注》以八股文法解詩這一問題進行綜述和評價；下編部分著重探討“明遺民”這一特殊讀者群體對杜詩的接受情況，皆不乏勝義。作者擅於通過分析典型例證來說明重大問題，比如在論述明遺民的杜詩接受時，選取了朱鶴齡、王嗣奭、方文三家一一加以考察。因為朱鶴齡對杜詩中蘊含的性情體察甚深，王嗣奭對杜甫“詩聖”說多有發明，方文對杜詩妙於敘事有獨到的領悟，這三家各自從不同方面代表了鼎革之際文士們對杜詩的解讀，很能說明問題。書中評析，也多體現出立論公允、謹慎而不失通達的特點。在錢、朱注杜之爭的討論中，作者肯定錢注《洗兵馬》一詩符合當時的歷史政治背景，但對於該詩的主旨，認為錢注“刺肅宗”之說有推論太過之嫌，朱鶴齡所云“以太平之功望肅宗”則失之簡單，可謂頗具自身心得。儘管如此，作者對錢謙益的“詩史”觀念依然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仇兆鰲以八股文法解注杜詩的現象，本書將之歸結為詩文兩種文體批評方法之間的相互滲透和影響，認為雖然這一方法存在機械性的缺

陷,但不論優劣,作為一種批評方法也並非不可行。作者在導論中曾提到:現代學術論文或論著大致是以“問題”為中心的。應該說,劉著在發掘問題的眼光、考察問題的角度、論述問題的立場和方法等方面都體現出很强的駕馭能力,這種清醒的認知與不懈的實踐值得充分肯定。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雖然該書的研究對象為杜詩學,但高度重視杜詩文本,並未脫離杜詩而空談杜詩學。書中援引杜詩原文的例子不勝枚舉。譬如在對杜詩異文校勘、杜詩箋注、杜詩分段、杜詩中的連章詩、杜詩接受等諸多問題的探討中,作者在論述時頻繁地回歸杜詩文本,以求更好地說明問題。如果說,上述諸問題的討論和解決必然不可脫離杜詩文本,那麼,在一些看似與文本缺乏直接或密切聯繫的問題中,作者仍能夠依托文本展開挖掘,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這就不得不說是獲益於作者多年誦讀杜詩所形成的深厚沉澱。書中對錢、朱注杜之爭的討論,所選切入點是對《洗兵馬》一詩的詮釋。在作者看來,錢、朱二人注杜分歧的焦點即在對《洗兵馬》一詩的理解。從書中考察該問題的角度,不難看出作者重視杜詩文本的意識。再如,在杜詩章法論部分的概論中,引杜甫《敬贈鄭諫議十韻》一詩,分析“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一聯中“波瀾”一詞歷代學者的不同見解,由此,各個時期論杜詩詩法的傾向性被鮮明地呈現出來。尤其在下編杜詩詮釋論部分中,作者即便是探討明末清初杜詩學中關於杜詩詮釋的諸如“意”與“法”之間的關係、“意法論”產生的理論背景等理論性較強的問題,依然大量回歸杜詩文本以輔助論述。文本是文學研究的核心,重要性不言而喻,對文本的熟悉程度充分反映出文學研究者的學養與功底,然而考察同類的其他專著,普遍存在著輕忽杜詩文本、批評與作品脫節的弊病。兩相對照,更體現出劉著的突出價值。

韋勒克、沃倫在《文學理論》(劉象愚等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文學的內部研究”部分的引言中提到:“文學研究

的合情合理的出發點是解釋和分析作品本身。”劉著對明末清初杜詩學研究的把握，與韋勒克、沃倫的內部研究思路有相當契合之處。同類的其他專著，如簡恩定先生《清初杜詩學研究》、孫微先生《清代杜詩學史》、張家壯先生《明末清初杜詩學述論》，各自都對研究對象的外部背景有所探討，劉著則有意識地將明末清初杜詩學研究的背景問題忽略了，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杜詩學內部研究專著。作者完全從杜詩學內部因素著眼的研究格局獨樹一幟，且成績斐然，不過，背景研究被忽略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該書達到更高的廣度和深度。明末清初是一個充滿張力的特殊歷史時代，這一重大時代背景與書中著重論及的錢注杜詩、明遺民接受問題都有很大的關聯，適當論述之，會對內部研究有所裨益。“杜詩學”亦與當時的詩學背景、學術背景分不開，在著眼於研究對象自身的同時，如果能進一步地結合時代背景、詩學背景、學術背景加以考察，相信會有更為完整、豐富、立體化的研究面貌呈現出來。

此外，劉著擅長以典型見整體，書中所選定的具體研究對象往往是公認的最具代表性的，譬如《錢注杜詩》之於明末清初的杜詩箋注，這體現出相當準確的學術眼光，但也不無可商榷之處。例如在“明遺民與杜詩”部分，書中從衆多明遺民中選取數位以觀照整個遺民群體的杜詩接受，給出的選取標準之一是須有杜詩學著作，這一標準當是嚴格地從杜詩學自身著眼提出的，實際上，這一點可以不必過於執著。某些明遺民中的著名學者，如王夫之，雖無研杜論杜專著，但《薑齋詩話》所載其對杜詩的評論亦頗具特色。如果可以從更普遍的明遺民讀者群體中去歸納、比較其見解，發掘整體的接受特徵，結論會更具說服力。文學研究中點與面如何更好地結合？這是一個值得不斷反思的問題。

南京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專業

2013 級碩士研究生 王秋萍